

释道安也是孔子后人考

王 再 兴

提 要：关于东晋释道安的身世，学界常用的原始资料中都称他出生于英儒世家，因遭遇“永嘉之乱”年幼时就成了孤儿，由外兄孔氏抚养长大。那么他的母亲是孔子后人吗？从而道安也系孔子血脉吗？通过仔细考证，本文的答案是倾向肯定的。

王再兴，襄樊学院释道安研究所讲师。

主题词：道安 家世英儒 孔子

关于东晋释道安的身世，学界常用的原始资料主要有释僧佑的《出三藏记集》，释宝唱的《名僧传抄》和释慧皎的《高僧传》三种。这三部文献先后成书于南朝梁天监年间，此时离道安生活的时代只有一百余年，所以它们是研究道安生平最宝贵也最可靠的资料。根据这三种文献记载，道安出家前原籍在“常山扶柳”^①，祖上姓卫，其中《名僧传抄》和《高僧传》还提到道安年幼就成了孤儿，由“外兄孔氏”抚养长大的情况^②，而这两种材料中，又有《高僧传》明确指出道安“家世英儒”的出身背景^③。

本文要探讨的问题是，既然道安有一孔氏外兄，那么孔姓无疑就是他母系家族的姓氏了，同时《高僧传》又明白无误地宣称道安出身于英儒世家，那么我们可否考证而得道安的母亲是儒家创始人孔子的后人，从而道安也系孔子血脉呢？

—

首先我们需要仔细考查《高僧传》称道安“家世英儒”的可信度，尽管自古以来道安研究学者似乎都顺理成章地接受这一结论。

慧皎的原话是这样表述的：“释道安，姓卫氏，常山扶柳人，家世英儒，早失覆荫，为外兄孔氏所养。”^④乍一看，人们通常会很自然地“家世英儒”一语与道安的卫姓父系家族关联起来，因为它紧接在“常山扶柳人”后面。但我们知道古文是没有标点的，文意常常因断句和标点法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这段文字里，如果将句号加在“家世英儒”后面，人们将更有理由做上述理解，尤其是考虑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我们习惯上认为血统、姓氏和家世都由男性传承。然而，这一句介绍道安身世的话按理当止于“为外兄所养”，所以其中“家世英儒”一语也可能是指道安的母系孔氏家族而言，只是碍于女性不能继承血统和家世的传统观念而不便明示。另外，从逻辑上讲还有第三种可能，那就是

将它理解为对道安父母双方家族兼而言之。

至于道安的英儒家世到底是出于他的父系家族，还是他的母系家族，又或他的父母双方家族皆称得上英儒世家，这里暂且不论。回到《高僧传》称道安“家世英儒”本身的可信度上来，我们不难发现，作者慧皎对他的这一结论无疑是持之有故的。根据《高僧传》记载，尽管道安年幼失怙，以后在外兄孔氏抚养下“年七岁便解音读书”^⑤，然后又在十二岁那年出家做了小沙弥^⑥，但是道安的儒学素养却极其深厚。晚年在长安，有人拿来一尊新发现的鼎器向道安请教上面的铭文大意，道安告之鼎器上的铭文是篆书，意为春秋时期鲁襄公所铸，并当场将鼎器上的篆体铭文改写成当时通行的隶书字体。^⑦另一次有人拿来一把形状怪异的铜斛，请教道安这是哪朝哪代之物。道安告之，这是王莽新朝的衡器，因为王莽篡汉之后大行托古改制，所以故意在铜斛上铸上篆体铭文，并称这种衡制源于上古舜皇，于是颁行天下。^⑧鉴于道安的渊博学识，前秦王苻坚敕令朝中学士皆拜道安为师，以至于当时长安流行一句口头禅，称“学不师安，义不中难”^⑨，意为如果不拜道安为师，治学就得不到要领。

宝唱的《名僧传抄》虽没有明说道安出生于英儒世家，但在字里行间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甚至比《高僧传》透露出更多的细节信息。文中称：“孩稚而家婴世祸，外兄孔氏鞠养之。年七岁便解音读书。五经文义，稍已通达，迄于志学，邪好佛道。”^⑩这段话用字精炼，含义隽永。其中的“鞠”字告诉我们，外兄孔氏对年幼的小道安钟爱有加，寄予了殷切期望。“年七岁”才发蒙读书，即使以现今的标准来看也有点晚，古代蒙学应该更早些，显然是因为“家婴世祸”，意即道安儿时家中蒙受了巨大的社会灾难^⑪。接下来的这一句更加意味深长。按常理和当时的历史背景，遭遇“世祸”之后不可能马上就有现存的私塾学堂可供读书，更不大可能有教授全部五经诗、书、礼、易、春秋课程的高级学堂，

所以道安必定是在外兄孔氏的家学传授下通晓了“五经文义”。尤其耐人寻味的是句中这个“邪”字。宝唱《名僧传》原著已经失传,现存《名僧传抄》系收入日本《续藏经》中的抄本,编者不解何以文中此处用一个“邪”字,于是加注云:“疑为初”^②。本文认为,或许正是这个“邪”字点穿了道安的家世背景,宝唱似乎要借此暗示人们,道安的外兄孔氏家族原为英儒世家,而身系儒家血脉的道安长大后却笃信佛道^③,所以他的佛道之好被人称之为“邪”。

僧佑《出三藏记集》中的道安传记材料没有直接提及道安是否出生于英儒世家的问题,但从该文引用《习凿齿致谢安书》称道安:“理怀简衷,多所博涉;内外群书,略皆遍观;阴阳算数,亦皆能通”来看,僧佑也很可能知道一些关于道安家世的背景信息,只是不便明说而已。^④

而且通过对上述三种道安传记材料的文献学考察也可以证明《高僧传》关于道安“家世英儒”的结论是可信的。从时间先后来看,僧佑的《出三藏记集》最早,慧皎的《高僧传》最晚,《名僧传》的成书时间介于前两者之间,而且它们中每前后相继的两种之间相距仅十来年。从作者关系来看,宝唱是僧佑的弟子,但慧皎与前两者都没有师承关系。从文献性质与题材内容来看,此三种文献材料又可分做两类。《出三藏记集》重点在于汇集佛经目录和介绍各种译本,所以学界常称之为《佑录》。其余两种纯属人物传记。宝唱称其编写《名僧传》的动机是“摭拾遗漏,文广不载”^⑤,可见他的道安传必定以乃师《出三藏记集》中的道安传为基础,然后加上自己的材料编写而成。现存《名僧传抄》中的道安传只有七百余字,且文章内容和结构残缺不全,显然不是宝唱原著道安传的全抄本。但是《名僧传抄》中关于道安为外兄孔氏抚养长大的记述却是《出三藏记集》中所没有的,所以在关于道安身世方面,宝唱比乃师做了进一步的细致研究,搜集并使用了更多的原始材料。后来,慧皎编写《高僧传》的动机却是因为不满意宝唱为某些“寡德适时……名而不高”^⑥的僧人立传,所以不难想见他在编写《高僧传》的过程中势必做了大量人物筛选与材料甄别工作。然而,即便是对宝唱的《名僧传》持公然的批判态度,慧皎也沿用了其中关于道安为外兄孔氏抚养长大并接受传统儒学教育的记载,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地做出了道安“家世英儒”的结论。可见慧皎的道安传记又必定是在参考了前两种道安传记材料之后,再加上他自己所掌握的新材料综合而成,因此与前两者相比,其全面性与准确性又有了明显提升。通过考察以上三种文献的前后关系和发展方向,我们不难发现,从《出三藏记集》的道安传到《名僧传》的道安传,再到《高僧传》中的道安传,道安“家世英儒”的结论经历了从无到有,从隐到显,从模糊到清晰地呈现过程,而且这一过程和发展方向本身也十分有力的证明了该结论的可信度。换句话说,尽管我们从三种道安传记材料的语句中难以断定该结论是指道安的父亲家族或母亲家族而言,又或兼而言之,但道安出生于英儒世家

这一结论本身是完全可信的。另外,结合上述三种道安传记材料产生的历史背景,本文认为其著作者既无必要也不可能捏造事实或妄下结论。说其“无必要”,是指佛教入华早期曾与道教争短长,却不曾与儒教争夺正统地位,所以用不着通过编造道安弃儒从佛之事来证明佛教优于儒教,说“不可能”,是因为以上三种文献的著作者都是当时颇有名望的学僧,且他们与道安之间也不过三四代之隔,如果捏造事实或妄下结论,难免遭人斥斥。

另外,我们从道安自己的文字作品里面也不难找到只言片语,证明道安虽然信佛,甚至出家做了和尚,但是他不是古代华夏文明的全盘否定者,相反他对汉末魏晋以来儒家文化的衰落式微感到痛心疾首。例如,道安对自己的命运和他所处的时代概括为:“余生不辰,值皇纲纽绝”^⑦,对当时五胡乱华的社会现状称之为“羆狁猾夏”^⑧,“戎狄孔棘”^⑨,其大意是:胡人乱华,但不过猖獗一时耳。从这些文字表述中我们可以领略到道安骨子里的儒家情怀。很可惜,道安的作品绝大部分都失传了,否则我们极有可能从他自己的著述中找到更多有关他的家世背景的言论。

二

接下来我们考察《高僧传》称道安“家世英儒”是指他的卫姓父系家族或孔姓母系家族,又或兼指父母双方家族而言的问题。

前文提到,由于传统文化观念和思维习惯,以前的道安研究学者都想当然地认为《高僧传》称道安“家世英儒”指的就是道安的卫姓父系家族,意指该卫姓家族世代持守儒家礼教的书香门第,在常山扶柳当地颇有些名望。本文认为,这种观点很可能错了。

首先,本文认为《高僧传》中“家世英儒”一语份量很重,远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书香门第”一语可以比拟的。查“英儒”之辞源当来自两晋时期大文豪郭璞(公元276—324)的《尔雅序》^⑩,意指具有全国性声誉的杰出大儒,特别是具有家学传统的儒家。而这里的“家世”是“世家”一词的动词用法,指享有朝廷封号和世袭爵位的贵族。所以“家世英儒”一语是很高的赞誉,普通官绅或习儒之家是担当不起的。再查《中国姓氏辞典》,卫姓出自周文王第九子康叔,康叔封于卫,卫亡于秦,其遗民遂以原国名为氏,可见该姓氏的确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光荣的血统。^⑪然而,这已是一个太过久远的故事,《高僧传》的作者显然不可能仅凭道安原籍姓卫就称其“家世英儒”。根据前述辞源学定义,道安的卫姓父系家族满足该称谓的必要条件是:其一,该家族在魏晋乃至汉代产生过海内闻名的儒学大家,其二,道安的父辈及祖辈往上数代之内不曾间断地拥有朝廷封号和世袭爵位。那么,道安的卫姓父系家族满足这两个条件吗?这个问题又将我们引向道安的籍贯和出生年份。

现存各种关于道安身世的史料都称其祖籍在“常山扶柳”。其中,《名僧传》的作者宝唱似乎对此有些存

疑,于是在文中称“道安本姓卫,诸伪秦书并云,常山扶柳人也”^②。这句话给人的感觉是,连宝唱自己也觉得“常山扶柳人”之说法欠妥,可又无法考证其真伪,只好依“诸伪秦书并云”之说法。现在,宝唱的疑惑终于可以解开了。根据湖北襄阳的民间学者胡中才先生考证,道安的家乡扶柳县在《晋书》地理志中不属常山,而属安平。^③对此,笔者在准备本文资料时做了更详细的考查。结果发现,即使在汉魏时期扶柳县也不曾有过隶属常山郡的记录。常山属冀州,在汉初称“常山国”,东汉光武年以后改称郡,辖真定、石邑等八县,大致相当于现今石家庄和周边郊县一带。安平也属冀州,汉初亦称“安平国”,在东汉及魏晋时期曾相继更名为“信都郡”、“广川国”、“长乐郡”,辖信都、下博、扶柳等八县^④。扶柳作为地名至今尚存,但现在它既不是一个县名,也不是一个乡名,而是一个村名,即现今河北衡水冀州市小寨乡扶柳村。

关于道安的出生之年,前述原始材料中都没有明确记载,但不难推算而得。学界公认的做法是,根据僧佑的《出三藏记集》中记载:“(道安于)建元二十一年二月八日斋毕无疾而卒”^⑤,此“建元”系五胡十六国中前秦年号,苻坚于公元365年称帝,从而可知道安于公元385年逝世。然后又根据道安在一篇写于此前两年,即建元十九年的《鞞婆沙序》中称“恨八九之年方窥其牖耳”^⑥,得道安一生享年七十有四,从而推算得他的出生年份当为公元311年。又根据古人按虚岁计算年龄的习惯,所以道安的实际出生年份当为公元312年。按中国传统的朝代纪年法,道安出生这年是西晋孝怀帝永嘉六年,而这一年就是史称“永嘉之乱”的次年。由此可见,上述推算结果又与《名僧传》称道安“家婴世祸”,《高僧传》称道安“早失覆荫”以及与道安自述“余生不辰,值皇纲纽绝”都是相吻合的。

然后我们再根据道安的籍贯和出生年份往前追溯一二百年,查魏晋乃至东汉时期勉强算得上儒学世家的卫姓家族只有并州河东郡卫觚及其后世子孙。卫觚系汉明帝时海内闻名的儒学大家,其四世孙卫觐(公元155—229)又在曹魏官至尚书令,与当时“邺中七子”孔融、王粲等齐名,算得上一代文豪,而且在魏文帝、明帝两代被封侯^⑦。卫觐之子卫瓘(公元220—291)在魏晋两朝皆得重任,在魏元帝时曾“拜侍中,持节慰劳河北”^⑧,又在西晋朝历任镇西将军、征东将军、青州刺史、幽州刺史,亦曾封侯,可惜晚年在“八王之乱”中受牵连,与子孙九人一起被贾太后杀害^⑨。卫瓘的孙辈中尚有卫璠和卫玠幸免于难,此二人也算是当时学界名流,但史料并没有他们迁往冀州安平的记载。而且他们的生平年代大致与道安父辈相当,如果道安是其后人,则《晋书》卫瓘传中当有明确记载。由此可见,道安不可能是卫觚家族的后人。

至此,我们得到的阶段性结论是,道安“家世英儒”的血统不可能来自于他的卫姓父系家族,从而也排除了他的父母双方皆属英儒世家的可能。

三

那么有无可靠史料支持道安的孔姓母系家族系英儒世家呢?

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笔者发现编订《五经正义》的初唐大儒孔颖达(公元574—648)的祖籍在冀州下博,顿时联想到:莫非道安的母亲孔氏与孔颖达同属冀州孔门后人?

先确认孔颖达的籍贯身世。查唐代谱牒姓氏学汇编《元和姓纂》中记冀州孔门曰:“本出鲁国。十七祖汉下博侯阳,因居冀州下博。裔孙唐国子祭酒、曲阜子颖达。”^⑩此处还有罗振玉校云:案“阳”,唐表中作“扬”^⑪。再查“下博”地名,其实就是河北衡水县的古称^⑫,在《晋书》地理志中亦记为冀州安平郡所辖,且与道安家乡扶柳县相邻,下博在东,扶柳在西,两县之间的中心距离仅三十里。

再查《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其中记载道:“下博孔氏出自关内侯福七世孙郁,后汉冀州刺史。生扬,下博亭侯,子孙因居焉。七世孙灵龟,后魏国子博士,生硕。”^⑬该处史料记载还详细著录了从孔子到关内侯孔福,再到孔郁的世袭传承情况。根据这一段文字记载,孔福是孔子十四代孙,孔郁为孔子二十一世孙,下博亭侯孔扬系孔子二十二世孙。然后再核对《史记·孔子世家》和《孔子家谱世系表》,三者所记载的相关谱系传承情况是完全吻合的。

以上史料记载表明,孔子的后裔中有二十一世孙孔郁因官迁后汉冀州刺史之职而定居于下博,其子孔扬受封为下博侯,从此以后这一门孔子后裔世代繁衍兴盛于斯,直至唐初还涌现出了像孔颖达这样的盛世鸿儒。根据汉朝和魏晋时期的封爵世袭制度,自孔郁之子孔扬被封为下博亭侯以后,冀州下博的这一门孔家子孙就一直享有侯门贵族的身份,故《新唐书》称“子孙因居焉”。

可惜孔郁来冀州做刺史的年份及相关情况在正史《后汉书》中找不到任何记载。但我们也不妨尝试推算一下。学界一般认为孔颖达为孔子三十三世孙,且两人相距1100余年,所以从孔子到孔颖达平均约34岁为一代人。按此标准推算,二十一世孙孔郁约生于公元160年前后。又按“三十而立”估计,则孔郁大约于公元190年前后来冀州做刺史。再对照《后汉书》和《三国志》相关记载,公元190年正好是汉献帝继位之年,当时董卓专权,派韩馥领冀州牧,韩馥之后领冀州牧的是袁绍,袁绍之后是曹操,这都是人们所熟知的。因此,孔郁任冀州刺史的时间应当稍早于公元190年。又根据《孔子家谱世系表》,孔郁有四子,在长子孔扬之外还有衍、震、潜三子。孔衍生平事迹收入《晋书》儒林列传^⑭。孔潜亦见于《晋书》孔愉传,文中记载道:“曾祖潜,太子少傅,汉末避乱会稽,因家焉”^⑮。既然孔郁之子遭遇了汉末之乱,则可推定孔郁来冀州做刺史的年份当在此前不久,很可能就在汉灵帝(公元168—189年在位)年间。由此可见,以上推算虽不中,却也不远矣。

将上述年代推算与道安出生年份相结合,如果道安

母子俩确系下博侯孔扬后人，则道安的母亲按辈份应为孔扬的孙女，而道安则是其重外孙，同时也是孔子的第二十六代重外孙。

到此为止，有关道安“家世英儒”的所有已知和可以推知的条件都齐备了，让我们回到本文的核心问题上来，即归根结底道安母亲是来自冀州下博侯孔扬家族的千金小姐吗？

回答是肯定的。既然前述三种关于道安生平的一手传记材料都支持道安出生于英儒世家的结论，而他的卫姓父系家族又不可能符合这一结论所需条件，那么道安的英儒家世只可能来自于他的母系家族。既然道安的母亲确信无疑地姓孔，而且根据以上确凿无疑的正史资料记载，下博侯孔扬家族又十分完美地满足英儒世家的条件，那么道安的母亲就必定是下博侯孔家的千金小姐，而不是其它非孔子血统的孔姓女子或虽属孔子后人却无贵族身份的孔氏平民女子，否则，《高僧传》称道安“家世英儒”的结论就不能成立。此外，还有如前所记两项已知条件支持上述推理，一是地理条件，下博侯孔家与扶柳卫家相距仅三十里，这使得道安母亲当年从下博嫁到扶柳成为可能；二是历史条件，道安四岁失怙，七岁才启蒙，然后十二岁就出家了，若非下博侯孔门的家学传承不足以让少年道安得到如《高僧传》所记载的那样渊博精深的儒学教育。

尾 声

尽管本文的直接动机是要搞清楚道安是否为孔子后人，但这个问题本身并不是本文的终极目的。如果说古人可能因为道安只是孔子的外姓子孙而对他的孔门血统一笔带过的话，我们今天也不认为道安的思想文化成就主要取决于他的血统。然而，道安血液中的孔子基因提示我们应更多的关注道安思想和精神品格里面的本土儒家文化要素。自古以来，道安被公认为使佛教中国本土化的奠基人，但人们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正是这位身系孔子血脉的儒家叛逆创建起来的佛学思想体系发展成熟之后竟反哺了儒学，而且最终导致了新儒学，即宋明理学的兴起。道安的佛学思想体系是怎样的？他从哪几个方面奠定了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基础？为什么佛学思想能够有补于儒学？这些都属于道安研究领域中的核心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更多地用历史的、理性的视角来探讨这些问题，那将是极富学术挑战性与趣味性的。就此而论，本文对道安是否为孔子后人的考查仅仅是我们计划中的新一轮学术之旅的起点。

（责任编辑：东月）

- ①《大正藏》第 55 册，第 108 页上；第 50 册，第 351 页下；《续藏经》，台北：新文丰，第 134 册，第 12 页中。
- ②《大正藏》第 50 册，第 351 页下；《续藏经》，台北：新文丰，第 134 册，第 12 页中。
- ③《大正藏》第 50 册，第 351 页下。
- ④ 同上。

- ⑤《续藏经》，台北：新文丰，第 134 册，第 12 页中。
- ⑥《大正藏》第 55 册，第 108 页上。
- ⑦《大正藏》第 50 册，第 353 页上。
- ⑧ 同上。
- ⑨ 同上。
- ⑩《续藏经》，台北：新文丰，第 134 册，第 12 页中。
- ⑪此处“嬰”通“膺”。
- ⑫《续藏经》，东京：国书刊行会，第 77 册，第 352 页上。
- ⑬此“佛道”不是佛教和道教的合称，而是“佛教之道”，即佛教。此为早期佛教文献中的习惯用法。
- ⑭《大正藏》第 55 卷，第 108 页中。习凿齿（公元 317—383），佛教居士，东晋著名文学家，史学家。谢安（公元 320—385），东晋丞相，著名政治家，军事家。
- ⑮《大正藏》第 50 册，第 427 页下。
- ⑯《大正藏》第 50 册，第 419 页上。
- ⑰《大正藏》第 55 册，第 69 页下。
- ⑱同上。獬豸亦作“狴犴”、“严允”等，语出《诗经·小雅·采芣》：“靡室靡家，獬豸之故，不遑启居，獬豸之故，……岂不日戒？獬豸孔棘”，是古时华夏对匈奴的蔑称。“猾夏”即乱华，语出《尚书·舜典》之“蛮夷猾夏”。
- ⑲《大正藏》第 55 册，第 45 页上。“戎狄”是古人对西北少数民族的蔑称，“孔棘”意为猖獗一时也，语出典故同上。
- ⑳书中云：“《尔雅》者，盖兴於中古，隆於汉室，豹鼠既辩，其业亦显，英儒瞻闻之士，洪笔丽藻之客，靡不钦玩耽味，为之义训。”
- ㉑陈明远、汪宗虎主编：《中国姓氏辞典》，北京出版社，1995 年，第 435—436 页。
- ㉒《续藏经》，台北：新文丰，第 134 册，第 12 页中。文中“伪秦”指五胡十六国中的前秦，因其不合于华夏正统而称之为“伪”。
- ㉓胡中才：《弥天释道安》，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4 年版，第 3 页。
- ㉔《晋书》，第 273—274 页；《魏书》，第 1663—1665 页；《后汉书》，第 2338—2339 页；以上文献皆采用中华书局 2004 年 1 月版。
- ㉕《大正藏》第 55 册，第 109 页上。
- ㉖《大正藏》第 55 册，第 69 页下。
- ㉗《晋书》，中华书局，2004 年 1 月，第 691 页。
- ㉘同上。
- ㉙同上，第 694 页。
- ㉚（唐）林宝：《元各姓纂》卷六，第 809 页。
- ㉛同上。
- ㉜现今“下博”地名仍在，也只是一个村名，位于河北深县境内。
- ㉝《新唐书》，中华书局，2004 年 1 月，第 2809—809 页。
- ㉞《晋书》，中华书局，2004 年 1 月，第 1574 页。
- ㉟同上，第 1365 页。